

从《父子之间》看早期生活对奈保尔文学创作的影响

梅晓云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父子之间:家庭书信集》为我们研究奈保尔提供了最为真实可信的历史材料。通过分析这部家庭书信集,揭示出作家少年时代特立尼达生活的“文化悬挂”,青年时代留学英伦经历的“文化祛根”,以及父亲在文学上对儿子的影响;所有这些对于奈保尔精神气质和文学理念的初步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作家后来的“文化无根”状态,与这一时期的生活有密切关系。对这部书信集的研究,是全面了解奈保尔的必要起点。

关键词:奈保尔;文化悬挂;文化祛根;文化置换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3)02-0118-06

《父子之间》[1]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与家人之间往来的真实信件的汇集,记录了奈保尔青年时代迈出的对自己和自己族群的关键一步、在英伦怎样被抛入西方文化对他的“置换”状态以及产生出对他影响极为深刻的文化无根感的真实心路历程,具有作家研究的珍贵史料价值。

这部书信集的时间范围主要是1950年到1953年在牛津留学期间和附录的1954到1957年这一段生活;内容是与父母、姐妹的通信,但重点是父子之间的思想交往;空间范围是特立尼达(父母及家人所在地)——印度(姐姐卡姆拉读书之地)——英伦(奈保尔的留学之地)。时间不长,空间却不能说小,反映的生活内容则非常丰富。当时,特立尼达还是一个地处西印度群岛的英属殖民地,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都非常落后,只有在首府西班牙港才有像样的中学,奈保尔通过努力争取到英国留学机会,于1950年进入牛津大学英文系学习,这时奈保尔才是一个18岁的不谙世事却又颇早熟青年。而其父则在西班牙港的《卫报》从事记者工作,在当地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其实却是个不仅生活困顿,而且文学才具有有限的人(生前他自认为重要的作品甚至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由于长期操劳和压力,终于在1953年儿子牛津毕业那一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死前没能与儿子见面,奈保尔一生都为此深感愧疚。父亲与儿子之间的通信是这部书最重要的内容,不仅反映出父亲的舐犊深情,而且可以使我们看到父亲对奈保尔的深刻影响,也可以读到青年奈保尔当时的思想感情、文学抱负以及后来的精神危机。而当时他的姐姐卡姆拉也得到一笔奖学金去印度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留学,这位不懂印地语的“印度人”第一次近距离体会到自己母邦的氛围,奈保尔与姐姐的通信反映出印度海外移民第三代——即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以自嘲的口吻谑称的“夹缝人”——对印度的态度,他们姐弟之间的交往对于我们了解奈保尔的家庭和他们当时的思想状况有一定价值。在通信集中还有几位亲戚出现,这些个性各异、背景不同、身份有别的人物,虽不是直接通信者,却也从另外的侧面反映出奈保尔的生活处境和时代特色。

《父子之间》的价值在于它的历史真实性,反映了当时作家的家庭状况、自己的现实生活、思想感情、文学观念、精神状态等,也是我们分析其性格形成和创作态度以及文化困境产生原因的重要第一手材料。

收稿日期:2002-11-20

作者简介:梅晓云(1954-)女,江西寻乌人,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

1. 文化悬挂与文化祛根

奈保尔 1932 年出生在特立尼达的一个印度移民家庭,是印度契约劳工的第三代。一般来讲,第三代移民多半都已经融入当地社会。但是我们看到,奈保尔的情形不同,他这个移民后代在淡化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却又无法认同当地文化,依然把特立尼达视作是异己的土地。当老一代人成天做着不切实际的“回家”梦时,年轻一代却为“再移民”而竭尽全力。奈保尔很早就立下志愿要去英伦求学,多年后通过努力而如愿以偿。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到,奈保尔从来没把特立尼达视为安身立命之地。1949 年 11 月 24 日奈保尔致卡姆拉的信里写道:“我呆在特立尼达的日子已快结束了,只剩下 9 个月了。这之后我将离去,决不再回来,我确信如此。”[1]奈保尔后来的确没有再回去,即使在父亲病危、家人要求他回家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回到这块令他避之惟恐不及的地方。在牛津的日子里,他曾经深陷精神的痛苦之中,非常非常想家,说“好像是昨天才离开”,并且“每一处景物都清晰地刻在心中”[1],但是这只是对家人的思念而不是对土地的深情,也就是说,很早,奈保尔就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人与土地的分离的状况之中。他把回特立尼达看成是可怕的毁灭。1953 年 10 月 8 日奈保尔致信父亲说:“我知道,也能理解你希望我在特立尼达定居。但是,让我解释,为什么如果这样做我将会死——死于知识、智力的饥渴。”[1]正如此前他在一封给姐姐的信中所说:“返回特立尼达,不过就是在 QRC 或公务机构工作,这意味着所有抱负的终结”。[1]他把这块祖辈就移居的土地看成是未开化的野蛮之地,人民狭隘保守,从特立尼达来的亲戚们愚笨粗俗又令人讨厌,当地的报纸“荒谬至极”,以至认为“特立尼达是大海中最可笑的一座岛屿”(1951 年 1 月 27 日,致卡姆拉)[1]。父亲死后,他给母亲写信说:“我认为我不适宜特立尼达的生活方式,如果要我在那里度过一生,我会死掉。那地方太小,价值观念都是错误的。它是微不足道的。”(1954 年 5 月 3 日,致母亲)[1]这样,实际上奈保尔已经把自己“悬挂”在特立尼达文化之外,作为外来移民,这是意义深远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虽然出生在特立尼达却不是特立尼达人,他没有特立尼达人所必须的特立尼达文化特征,这样,一开始就注定了作家其后必然要遭逢的文化认同危机,在后来反映特立尼达生活的作品里,这个地方常常只是个被嘲笑被戏谑的对象。

作为印度移民的后代,如果他和他的族裔人民

能够保持自己的传统,认同母国文化,他们就还是有“根”的,但是实际情况却如前所述,这种认同感不是增强,而是越来越淡化。第一代移民努力在远离故国的西印度群岛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要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自己家乡环境的地方创造一个印度文化的“飞地”,好比《毕什瓦先生的房子》里那处“哈奴曼大宅”里的人们,说印地语,唱印度歌,读《罗摩衍那》,行印度教仪式,实行种姓制度,并保留着一切从印度带来的东西,甚至新建房屋的式样都要严格恪守故土的形式[2],正如他后来在另一部书中所说,加勒比地区的特立尼达印度人社区与他们的祖国北印度的乡间生活没有什么区别[3]。但是到奈保尔父亲这一代,情况已悄然发生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封闭的印度社区生活,也不再对宗教满怀虔诚之心,奈保尔的父亲就曾因为对印度教的不敬而遭到过当众惩处;奈保尔自己也在童年时就表现出对宗教的淡漠,前往印度求学的姐姐卡姆拉却已经不会说自己的民族语言。这位移民作家本人甚至在 1962 年第一次印度寻根之旅以前就主动把自己与母国分隔开了,他说因为不信印度教而母国对他关上了大门[4]。

他与印度的关系在这部书信集里一部分是通过与姐姐卡姆拉的信件往来体现的。还是在去英国之前,奈保尔就以鄙视的口吻谈到印度,他告诫在贝拿勒斯读书的姐姐要小心,因为“印度人是一群贼”;他引述某一位欧洲作者的话,说印度是一个肮脏、贫穷、悲惨的国家,“充斥着自负而平庸的人,没有前途”;对于印度教和苦行僧、对于宗教冥想和神秘主义,他是完全排斥的,他对姐姐说,“你处在所有古怪事物的中心,请不要受到毒害和玷污。”他们姐弟都缺乏对自己母国文化的敬意,不仅把印度看成是“一个依然凭借其全盛时期的力量运行的死亡的国家”,而且常常以讥讽的口气谈到自己的母邦:“印度式的愚蠢”、“聪明的印度人太容易成为内省的牺牲品”、“令人感到无望的地方”;如果认为某位来自特立尼达的姑娘不够聪明,他会说“特蠢,特印度”,如果要评价一位愚蠢的“天主教知识分子”,他会说“就像特立尼达任何一个乡下印度人一样迷信无知”,奈保尔甚至戏谑地为姐姐拟写的印度经历起了这样一个书名:《我的印度之行:不愉快的六个月纪实》,等等。一般来说,作为印度人,最重要的文化依傍和精神归宿是宗教——印度教,虽然维·苏·奈保尔的家庭是正统的婆罗门,前辈们也都尽力保持这一传统,但是“人强不如势强”,生活无可奈何地要往前走,我们可以从父亲寄自特立尼达的许多信中读到生活的深刻

变化:奈保尔的姐姐卡姆拉准备与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小伙子结婚;表妹蒲洛抛弃了一个英俊的印度教小伙子而宁愿与一个“黑得像煤炭的家伙”谈恋爱;另一位表妹迪奥认为“印度教姑娘与黑人结婚没什么不好或可怕”;她们都非常热衷于跳舞和牛仔裤。所有这些,当然与印度教传统背离甚远。但是父亲的思想显然是他自己的孩子们如此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可以发现父亲对印度教和印度传统的态度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孩子们。有时他对印度教的态度可以说是世俗实用主义的,甚至是庸俗的。为了让儿子认识当时在牛津担任东方宗教教席的印度著名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后来此人做了印度总统),他劝奈保尔对其说:“我父亲一直敬仰你,把你看成是当代印度最伟大的头脑之一,他经常说从来没有像读你的《印度斯坦的心脏》一书那样深切地理解了印度教。”(1950年10月27日,父致子)其实他并不虔信印度教,谈不上对宗教的敬意。事实上,他认为“正统印度教的环境是令人沮丧的”,“印度教没有留下什么宗教印记是好事”;对于寻求享受同居的快乐而不想承担婚姻义务的女人,他说“也许这是聪明之举”。在1953年5月5日致母亲的一封信里,奈保尔也谈到对这类事情的看法,与其父思想如出一辙,甚至后来在妈妈担忧地劝他千万不要与白人姑娘结婚的情况下,还是与他戏称为“白塞壬”的英国女人结合了,这恐怕不是偶然。事实上父亲在谈到“家里发生的革命”的同时也已经观察到,在当时的特立尼达,印度教的“内部通婚”(种姓内婚制)正在终结。对于印度教最为注意的食物问题,他告诉儿子不必遵守印度教关于食物不洁的禁忌,希望什么都能吃,因为“现在海外印度人也都在吃牛肉”(奈保尔离家之初在国外对于食物的高度敏感和不适,而且在后来他的不少作品里也常常反映出这一点,甚至长期素食和禁欲,这显然是家庭长期遵循印度教关于食物的禁忌和宗教影响所造成的)。这样,印度教传统最为重要的几个特征:对宗教的尊敬、实行种姓内婚、婆罗门至上和食物不洁的禁忌[5],就都被消解了,他们与母国的精神联系渐行渐远、日益淡化,对于海外印度移民来说意义非同一般。本人曾经在一篇论奈保尔的文章里这样谈到文化认同问题,认为至少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族群认同(血缘承诺)、思想认同(文化承诺)和价值认同(意义承诺)[6],由以上内容来看,奈保尔早在《父子之间》反映的生活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所有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那时他显然是厌弃自己的族类、拒绝印度思想、不承认传统价值

的,反映出他正在经历着“文化祛根”的过程。然而,民族文化传统在一个移民身上,并非如一件旧衣服那样可以随意丢掉的,从奈保尔许多作品反映的情况来看,很早就为他所怀疑、批判的印度教文化,仍然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他自己对此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7]。

2. 文化置换与自我分裂

奈保尔是带着对特立尼达的厌恶和对印度教的拒绝、满怀希望和憧憬去欧洲的,那时也许他还不能意识到,牛津求学经历将造成他这样的“再移民”怎样的文化困境。如果说,在特立尼达,印度移民还能以自己民族文化的古老丰富自慰并傲视当地不甚开化的加勒比文明的话,那么,当作为殖民地居民的奈保尔“再移民”来到欧洲,来到强大的宗主国英国时,却甚至在文化上也被完全击溃了,政治和经济当然毋庸提及。牛津为来自殖民地的学子们展现了一个强大的文化欧洲[8]:正是在这里,奈保尔经历了一个远比表面贫困和文化悬挂更痛苦的被抛人“内在殖民”和“文化置换”的初步过程。

首先,是欧洲思想的强力嵌入。在牛津,青年奈保尔不仅热烈地阅读欧洲文学的经典,还广泛涉猎社会、历史、哲学、文艺等各方面的作品,并且实际处在英国的文化环境之中来体会这个宗主国在精神上的强大。他努力学习盎格鲁·萨克逊语、法语、拉丁语以掌握欧洲思想,读伦敦的《快报》、《镜报》、《泰晤士报》和大量欧洲文学作品,研究莎士比亚、维吉尔、狄更斯和托尔斯泰,充满仰慕地引证毛姆,阅读乔叟、弥尔顿、斯宾塞和萧伯纳,也可以约略发现他对希腊哲学和文化已经熟悉的线索。他不仅读万卷书,还行万里路,以一个来自“地球边沿”上的殖民地居民身份在欧洲旅行,从伦敦到巴黎-马德里-巴塞罗那-安达卢西亚,所见所闻,不能不影响一个青年学子的思想感情。他的作品里后来反映出来的欧洲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对欧洲政治和文化的钦敬之情,他的文化价值观的形成,都不能说与这几年的牛津读书没有关系,书信中他已经在与父亲讨论以英国华莱士的言论来评价印度现代作家R·K·纳拉扬了,要知道,此时他还不到20岁!

其次,是实际生活的潜在影响。有人指出,英国的知识分子精神是在俱乐部中产生的,恰如法国人的沙龙培养出了许多思想精英[9],而奈保尔在牛津竟参加了半打类似俱乐部的协会以扩大交游。交谈、抽烟、喝酒、跳舞、谈恋爱,这些行为远远溢出了印度教规范,也不能不对青年奈保尔产生人生观、世界观

和文学观的影响。他说，“除了伦敦，我不知道我还能生活在其他什么地方，一切都很方便：大出版社、博物馆、画廊、美妙的电影院、剧院，在这座城市里有如此丰富的生活。”伦敦的城市景观、牛津的古老传统、泰晤士河的风光、乡间的生活情调、大学的知识氛围和他最初的文学活动等等，都在对奈保尔发生着“移情”的功效，与欧洲强大的思想和文化一起悄悄地置换着奈保尔的内在生命，以至他的系主任直截了当地说“你太不像印度人了”（1951年12月1日，致家人）。当然，当时的奈保尔不可能意识到这一切的背后意味的是什么，直到中年方有所省悟，但到那时节，也只能是凄凉地服膺西方文化对他的强力嵌入，因为他已经具备或已经被改造得有了接受这种嵌入的“内在文化结构”了。

3. 文化“断奶”的滋味。

事情如果只是如上文所言的那样，很可能就只是一个殖民地居民被宗主国改造的平常故事。奈保尔远比这情况复杂：种族身份使他很早就有了“他者”意识，这部书中不少地方记录了青年奈保尔对肤色的过度敏感；文化上的悟识又使他明白英国不是他的祖国，不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他的早熟和聪颖，也使他看出牛津的“内囊”，他说这里的大多数学生平均智力远远低于他在中学六年级的水平（1951年1月27日，致卡姆拉），“要找笨男蠢女吗？牛津是也”（1951年2月12日，致家人），他对人对事的态度，更使他不喜欢这个“有着一半同性恋者的国家”；在钦慕欧洲的同时，他也常常思忖，什么是自己认同的文化？特立尼达？印度？还是英国？因此他在牛津的后期陷入精神崩溃和文化焦虑之中，以至小小年纪就谈到“死”，谈到“逃避”，就觉得只有不断旅行才能安心。到英国的第二年他就写道：“一种空空如也的感觉几乎一直伴随着我，我发现自己奋斗在一条两头都被堵塞的隧道里。”一头是他拒绝的特立尼达，一头是作为寄身之地的英国，既不能往回走，也看不到未来，他说“我对延长在这个国家停留的厌恶，不下于我对回特立尼达的恐惧”（1954年5月3日，致母亲）。他很早就在寻找安全感，他写到圣诞节的孤独和哀伤，向家人倾诉交朋友的困难，他还以故意做出来的愤世嫉俗、肆无忌惮来表达自己的倨傲不羁。他也为自己不顺利的文学之路而焦虑沮丧，为自己的穷困而自卑（“我的贫穷相当有效地把我从婚姻市场上踢了出来”），为这场“成长的戏剧”而烦恼。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意识到文化上被改造的滋味：“当然，我知道我崩溃的原因：孤独、缺乏爱。你明白，一

个人不是一段木头，送到海外，刻上两道记号作为受教育的标识。作为人，远不止这些，他感觉，他思考，某些人感觉得更多，思考得更多，他们痛苦……没有人在意你的不幸……”（1952年6月3日，致家人）；他说，“我的精神苦难成了他们嘲笑的对象”。而跨国教育正是殖民地人民被抛入文化上“内在置换”的有效手段，或许他父亲谈到儿子的精神危机时所言对我们理解这一点有所帮助：“我们不仅是血肉之躯，我们还是由思想造就的。没有‘病’或‘掏空’了的神经。它无关生理组织而与思想有关，让我们生病的是我们的思想。所有的病都是动物的人与文明的人之间的冲突的结果。”（1952年7月16日，父致子）父亲认为他应该尽早在心理上“断奶”，其实是要求儿子割断文化脐带，彻底地投入欧洲怀抱。可惜，儿子做不到，他的思想仍徘徊在东方和西方、印度和欧洲之间，成为在思想、感情、信念和价值观上自我分裂的人，这也是奈保尔后来长期所处的状况，他自己明确地说，“对我而言，要毫不费力地找到一个可以归属的社会是不容易的。”（1953年10月8日，致父亲）正如他后来的一部作品《浮生》，不正是这一分裂状态的表达吗？

三

父亲是奈保尔第一个文学导师，不仅引导他走上了文学道路，还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学观，可以说，是父亲雕塑了儿子的“写作的自我”，甚至父亲的精神气质和精神疾病也遗传给了未来的作家。奈保尔称自己的生命就是父亲生命的延续：“当我长大后，我发现我做的事情都令我越来越多地想起爸爸。我抽烟的方式，坐的姿势，摸着没刮须的下巴的动作，还有我有时笔直坐着的样子，我花钱时的冲动和愚蠢。……我对自己了解得愈多，对父亲的了解就愈多。……塑造了我的生活、我的眼光和品位的人是谁？爸爸！”（1951年9月30日，致卡姆拉）爸爸所有的兴趣长久地影响着他，包括语言的、文学的、写作的、甚至印刷的爱好都留在了儿子的心中。

奈保尔的父亲是记者型作家，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实践完全来自自己的生活，不是抽象的理论，他的文学才能是靠自学得来的。因此，他更看重写实笔法，更重视好故事。他很早就劝儿子要学会想问题、写故事，同时要有自己的写作特点和文学追求。他说：“如果你在所写的东西里都有这种属于自己的特点，你写的一切就都将是充满光彩的。我相信这种思

想的自由流淌源于充分放松毫无畏惧的状态,也归功于“取法乎高,仅得其中”的理想”(1950年10月22日,致儿子)[1]。他谈到自己的文学教训:当一个作家不再关注自己的感受而是去取悦读者的时候,结果他的文章就不自然而缺乏真诚;文章要写得清晰,那怕违背语言法则也可以,“如果为了语言和谐悦耳而必须用一个音节长的词,你就用好了。”[1]父亲再三告诫还是文学雏儿的奈保尔,写作是来自内心的需要,而不是脸上的事情,即使是个临刑前的半文盲罪犯给情人的信,只要他是真情实感,那也是文学,是诗。因此他希望儿子唤起“写作的自我”,坚持大量阅读的好习惯,研究历史上伟大作家的作品,并且时常练笔写些小东西,不要因为大学里那个“小儿科”的《伊希斯》杂志不起眼就看不起它。他总是在儿子消极、焦虑的时候给以鼓励,以自己的奋斗为例来给奈保尔“打气”。这些鼓励既有文学上的,也有世俗的。他劝儿子要坚持写作,也要争取与有身份的人交际,就像乡下人进城一样去打天下。“只要你运用你的自由与独立,它就将造就你。不要让抑郁、沮丧控制你。如果这种情绪不时袭来,就把它看作是匆匆过客,千万不要屈从它。自信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1950年9月15日,致儿子)。父亲难免对儿子絮叨,说些不要浪费自己的才华、要慎独守身的教诲,要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云云的话。因为父亲坚信,儿子的文学时代正在到来,不过,“在你‘抵达’之前,将会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障碍”,他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对成功者的“预考”(1950年10月5日)。

为了顺利通过这场“预考”,儿子在牛津真的很努力。开始是狂热地写诗,后来是拼命地写故事,大量地阅读和思考,为杂志和电台写稿等,他还是学校杂志的通讯员,并写些访谈之类的小文章。奈保尔听从父亲的劝告,写了些西印度群岛的题材并获得初步成功。同时,儿子的性格也在这场“预考”中得到磨砺,他的多思、敏感、刻薄、狷傲和恃才自负的性格特点已经生动可见。在与朋友的文学讨论中,他称与自己文学观点不同的女作家的话是“可笑的垃圾”;他给家人报告说,牛津的大多数学生“愚笨不堪”、“笨驴成群”;他把父亲任事的特立尼达《卫报》说成是“荒谬之极”;在批评欧洲文学名家时一样不留情,如缪塞尔·布特勒的作品“结构粗陋笨拙”、简·奥斯汀的作品只是女人的“闲言碎语”,使人厌烦;他评价印度著名作家纳拉扬的作品虽有好故事,却不是那么强悍有力,等等。

儿子后来实现了父亲的文学理想,也延续了父

亲的人生态度,甚至还继承了父亲的某些性格因素和思想特点,这些都可以追溯到记录青年时期的留学生活的这部家庭通信集中。

结 语

那么,这部家庭通信集里反映的生活究竟怎样影响了作家后来的文学创作?我以为至少可以这样来看:经过“再移民”的奈保尔,文化上已经走上一条日益趋近“无根”的道路,正在蜕变为有国籍却没有祖国、有血统却没有归属、有成就却没有族人喝彩的“无根人”。这使作家在日后的文学活动中始终难以有自己倾心的价值认同而表现出相当复杂的思想感情:他厌弃特立尼达,但是这个他的出生地却总是出现在作品里,难以一笔抹去,如他写了反映这个地方现实生活的《神秘的按摩师》、《米格尔大街》、《毕什瓦先生的房子》和《艾尔维热的选举权》等作品;他质疑印度,可是母国却梦魂牵绕,后来他的所谓“印度三部曲”(《黑暗之地》、《印度:受伤的文明》和《印度:大哗变》),反映出作家对自己的血脉所系之地的深情,对那里发生的一切都不能释怀;对于英国这个他生活了许多年并且拿着它国籍的国家,即使在今天,作家对它也没有真正的归宿感(如小说《浮生》),还是不自在,“还是会感觉自己是在别人的国家”,他甚至说,“到英国去玩在他人是寻幽探胜,在我却像揭起旧疮疤”[10];奈保尔几乎走遍世界,但走到哪里,都不是他的归宿,他常常郁郁寡欢地说“我没有祖国”[11],“我无处可去”[12]。这种深刻的痛苦一直伴随着他,也给了他观察世界的独特角度,作为后殖民时代的“书记员”,他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

牛津年代已基本形成了奈保尔的性格特征,读过他的作品的人,没有不对他的尖酸刻薄、恃才傲物、反讽讥刺、狷狂不羁的性格留下极为强烈的印象的,这不仅是他的个性,还是他的文风,反映出他的极端复杂的心理。有人这样描写奈保尔: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会质疑;他要求人群注意他,但又心胸狭窄器量小;他吹毛求疵嘲讽取笑;妄自尊大高不可攀,讨厌小孩、音乐和狗,不喜欢柔情小资等等,但是又出奇的天真,可爱,热情,善辩,精彩,杰出,富有信念[13]。你可能不喜欢这种类型的人,但是你不会不注意他,不会怀疑他的才气。多年的浪迹漂泊,尽观世态人生,反省自己的内心,思考生命的意义,使维·苏·奈保尔有一种别人难以具备的透彻!

父子之间的文学情缘当然是对作家有影响的,

同样,欧洲文学传统和印度文学传统也对奈保尔有深刻影响。如人所说,“奈保尔是一位现代的哲人,他继承了《老实人》与《波斯人信札》开创的传统,以一种值得钦佩的清醒的文风,把愤怒转变为明察秋毫的本领,让事件说出自身内在的可笑之处。”这主要体现在:奈保尔文学思想的现实主义倾向,欧洲文学的技巧与印度传统文学的结合,全景式观察视野与纤毫毕现的细节描写的统一,作品的现实关怀与历史意识,出色的故事结合着深沉的思想。父亲的告诫反映在他的创作中,如对加勒比地区生活题材的写作就带来了作家初步的成功,对好故事的重视使作家一直受到读者的欢迎,对“写作的真诚”的要求也造成奈保尔创作的特色,就如他自己所说,他反对为现实“搽粉”。牛津时期养成的旅行写作习惯,甚至是奈保尔文学生涯的重要特征,成为他的文学认知方式,他在世界的中心和边缘进进出出,到过非洲(见《河湾》和《维迪亚爵士的影子》),也常常出没于拉美和北美(见《游击队员》和《南方的转折》),还旅行过穆斯林国家(见《在信徒们中间》、《超越信仰》),写下了大量的作品,以全景式的视野记录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作家青年时代的“文化出位”,反映在他的生活体验、文学内容和思想实践中而造成他的作品的重要意义,即对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人民的文化困境的思考。

父亲去世前一年给儿子写信时将他们自己比作“就像扔在水面上的软木塞”。在我看来,这一譬喻不啻为一个谏语:“扔”——正是存在主义哲学所谓“抛入”,他们的生活是一种被形成的存在;“软”——是因为他们这样的移民没有祖国为依托,不能不是无力的;“浮”——是因为他们这样的移民没有文化之根,浪迹天涯精神无着是他们的常态。正好比阿尔贝·加缪所言,这些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完全崩溃了,他们不能不在一个“演员与布景分离”的舞台上

表演自己的人生戏剧。不难理解,为什么维·苏·奈保尔后来创作中常常有这样的思考:我们是谁?我们追求的“中心”在哪里?我们何时可以“抵达”?他们的生活已经被两头切断,没有族群的历史,没有自己的未来,也很难说有当下的真实,因为,他们在青年、或少年时代就已经被文化祛根了。童年的债,是要一生来偿还的。

参考文献:

- [1] V. S. Naipaul, *Between Father and Son: Family Letters*, ed. Gillon Aitken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0.
- [2] [英]奈保尔.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M]. 余郡琨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 [3] V. S. Naipaul, *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7.
- [4] V. S. Naipaul, *An Area of Darkness*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4.
- [5] 尚会鹏. 种姓与印度教社会[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6] 梅晓云. 无根人的悲歌[J]. 北京:外国文学评论,2002:(1).
- [7] V. S. Naipaul, *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7.
- [8] [英]梅尔茨. 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M]. 周昌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9] [美]刘易斯·科塞. 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 郭方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10] V. S. 奈保尔. 抵达之谜[M]. 李三冲译. 台北: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 [11] [美]保罗·索鲁. 维迪亚爵士的影子[M]. 秦於理译. 台北:台湾马可波罗文化出版社,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2001.
- [12] [英]奈保尔. 浮生[M]. 孟祥森译. 台北: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责任编辑 刘欢]

Between Father and Son: The Influence of Naipaul's Early Life on His Writing MEI Xiao-yun

(School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Between Father and Son: Family Letters* is a collection of the letters that V. S. Naipaul had communicated with the family during his Oxford study. This essay takes the book as an object of analysis and attempts to reveal how Naipaul had developed his spiritual temperament and literary ideas by the 'cultural dangling' in his childhood in Trinidad, the 'cultural disrooting in his youth in England and his father's literary influence. Reading the book will help us to study and understand the author.

Key words: V. S. Naipaul; cultural dangling; cultural disrooting; cultural displacement